

“統一歐洲”的 神話與現實

(自拿破崙至今日)

埃·戴而遜等著

世界知識社

“統一歐洲”的神話與現實

(自拿破崙至今日)

埃·戴而遜 讓·杜德里 著
克·維亞爾 雅·香白慈
凌其翰 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統一歐洲”的神話與現實

(自拿破崙至今日)

(法) 埃·戴而遜 讓·杜德里 著
克·維亞爾 雅·香白慈

凌其翰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

*

書號：425·787×1092 1/32·4印張·1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1,000 定價：(6) 0.36元

目 錄

序言	讓·布呂亞	1
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統一歐洲 的嘗試	埃彌爾·戴而遜	6
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的汎日耳曼主義和 歐洲思想	讓·杜德里	22
一 俾斯麥的歐洲體系		22
二 在世界和歐洲間威廉的汎日耳曼主義		32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 統一歐洲的嘗試	克勞德·維亞爾	49
一 洛迦諾的歐洲		50
二 希特勒的歐洲		62
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歐洲聯邦政策	雅克·香白慈	80
代跋	雅克·香白慈	119

E. Tersen, J. Dautry,
Cl. Willard et J. Chambaz

L'EUROPE

(de Napoléon à nos jours)

MYTHES ET RÉALITÉS

Éditions Sociales

根據法國社會出版社一九五四年法文版譯出

序 言

讓·布呂亞

首先舉出每天閱讀書報時偶然看到的幾項消息。在一本流行於法德兩國的小冊子上，我們看到關於法德歷史學家的會談情況。

“一九五〇年八月八日，二十五位歷史學教授在弗里堡聚首一堂，懷着堅決的意志決定放棄本國史的狹窄範圍，而在法德兩國和解的主旨下就歐洲的觀點從事歷史研究。”

以上是弗里堡會談中德國代表弗利特里克·瓦爾堡所說的話。日內瓦的歐洲文化總部財政顧問樊齊蘭爲了這個組織鑄就了兩種象徵性的紀念章。在一種紀念章上刻有查理曼大帝的肖像。在另一種紀念章上刻有查理五世的肖像。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世界報”報道說：

“歐洲委員會文化專家會議第八屆常會業已制定一項關於修訂歷史教科書的講習計劃。這項講習將於八月八日到十六日在挪威進行，這是繼續一九五三年在却爾姆（黑森林區）開始的工作。這一次將特別研究歐洲中世紀的歷史。”

歷史學家對於這許多倡議再不能漠不關心了，特別因爲這些表示並不是個別的，也不是自發的，而是試圖盡量利用歷史來爲目前的歐洲整體化政策進行辯護。法德兩國歷

史學家的會談增多了，這些會談的目的正如不來梅大學教授弗利特里克·瓦爾堡所說，在“從歐洲的觀點”來從事歷史研究。每個人對於我們學校裏所用的教科書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意見。但這首先是有關所有法國教育工作者的事情。他們很願意和全世界的同行們討論這個問題。但他們並不願意到波恩的什麼法庭上出席答辯。天主教歷史學家約瑟夫·伍爾斯所寫的一段話表達了法國極大多數大學教授的意見。他寫道：

“人們時常談到青年的國際教育。但是人們不常說起青年的民族教育，然而這也是同樣重要的。今天我們應該使法國人都知道不要爲了自己的國家而感到恥辱，不要爲了它的歷史而面紅耳赤。”^①

但是我們並不否認歐洲歷史的事實。這就是以下報告中所敘述的事實。作者們並不想追溯那些“歐洲防務集團”的擁護者所留戀的卡洛林王朝，雖然這項工作並不缺乏興趣。他們把研究的範圍只限於近代史和現代史。這些報告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歷史研究日那一天提出的。在這一天，有一百位左右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學教授聚首一堂。作者們在最後定稿的時候，曾經注意到當時引起的種種辯論。研究的題目計有四個：“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統一歐洲的嘗試”（埃彌爾·戴而遜）；“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的汎日耳曼主義和歐洲思想”（讓·杜德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統一歐洲的嘗試”（克勞德·維亞爾）；“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歐洲聯邦政策”（雅克·香白慈）。這是顯然四個不同的時代，爲了對這四個時代予以認真的解

① “政治和經濟年鑑”，一九五三年一月——三月。

釋，必須避免牽強附會，避免等同類推。當拿破崙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試圖組織歐洲的時候，資本主義尚在萌芽時期。在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是以一個革命的階級出現的。毫無疑問，拿破崙是想把他的勁敵英國從歐洲的市場上排除出去的。但同時，他在萊因區和意大利所獲得的勝利却終於破壞了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一八一五年以後所組織起來的神聖同盟，主要目的是爲了恢復這種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到了威廉二世執政的時候，我們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資產階級變成了一個沒落的階級。歐洲思想變成了汎日耳曼主義中的一個因素。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九年間，統一歐洲的嘗試並不是連續的。這是因爲想像中的歐洲已經不是歐洲而僅僅是西歐，它本身就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種手段。當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相當強大的時候，它就無須舉起統一歐洲的旗幟。它直接行動了。它自己的力量來摧殘各個民族，而不問這些政府是否自願放棄民族主權。爲了一個殘缺的歐洲聯邦而要消滅或限制民族主權的一切計劃都符合於雙重的目標：保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過去是威廉二世的德國和納粹德國，現在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並爲它作辯護，以及盡一切可能來延緩歷史前進中所無法避免的社會改革。由於這第二個目標，所以從一九一七年以來，一切統一歐洲的嘗試都直接地或間接地具有反蘇的性質。洛迦諾條約、慕尼黑會議、“歐洲防務集團”都標誌着歐洲這條反蘇的道路，都應該由歷史學家來加以說明。最近舉行的柏林會議更提供了證據。當莫洛托夫提議把安全條約普及到真正可以稱爲歐洲而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會否認其特徵的那個大陸時，那些並不把歐洲看作一個地理上的事實而把它看作“一個世界觀”的西方人就起來反對

這個建議了。又一次一個小歐洲起來反對真正的歐洲。又一次人們要求把民族獨立（特別是法國的獨立）爲了一個縮小的歐洲而犧牲，而莫洛托夫的計劃却規定了歐洲各國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一整套的協定。儘管皮杜爾曾教授過歷史和地理，但是在他看來，安卡拉倒是歐洲的一個首都，而布拉格、布達佩斯、索非亞、地拉那、布加勒斯特、華沙、莫斯科、明斯克、基輔却都不是歐洲的都市。哪一位歷史學家能够接受這樣的解釋？哪一位教授能够拿這樣的論斷來作爲他的教學基礎？

以下所發表的報告的作者們曾經從科學的觀點，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照耀下，研究了歐洲問題。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在我們看來，是能够得到歷史學家們的同意的。即使那些歷史學家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要他們忠實於科學的和民族的歷史傳統，而想加以整理，使它豐富。很顯然，在這樣的研究中，很多旁證被發現了，很多幻想被消滅了。但是還有些訛詐（這字眼用得並不太過分）應該由歷史學家來予以揭露。雨果曾經相信過一個統一的歐洲。成千的從戰壕裏回來的大學教授心中痛恨戰爭，以爲從此能够把歐洲組織起來。當白里安大聲疾呼：“大砲向後退！”的時候，他們都被他迷惑住了。不錯。但是對於種種事實加以嚴格的研究來揭穿那個不敢公開宣佈而用慷慨大方的措詞掩飾起來的政策，這不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嗎？指出目前人們怎樣利用各國人民要求諒解的思想來製造一種“歐洲”氣氛，這才是爲各國人民實現真正的諒解而服務的。各國人民的諒解是能够而且應該在互相尊重民族主權的基礎上實現的。

向公共輿論，特別向他們的同行們說這樣的話的歷史學家自己首先承認他們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他們知道在他

們的考據中有很多的缺點，更由於缺乏篇幅，沒有能够詳加引證和註釋。他們希望把他們的結論加以討論，因為他們確信對於各種思想和各種解釋的自由爭辯能够使研究現代事變的歷史科學得到進展。人們儘可以把學校組織浸沒在“歐洲”刊物的波濤中，人們儘可以組織“歐洲”日，但是法國大學教授們却不能採取人們硬要他們接受的立場。他們要求提出自己的主張。如果今天我們能够幫助他們認識得更清楚，我們就沒有荒廢我們的時間。現在讓我們以此作為示範來宣佈我們對於民族的和科學的歷史的忠誠，也就是在我們工作的領域內表示我們始終忠實於人們想要貶抑的民族價值。

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

統一歐洲的嘗試

埃彌爾·戴而遜

從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一四年，法國資產階級的大部分在“督政府”和“帝國”兩個不同政體的掩護下，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努力實現一個統一的歐洲。這顯然是從事實的客觀研究中所整理出來的歷史真理，可是這個真理却被許多歪曲言論所模糊，而且這些歪曲言論也不完全是故意的。

這是首先由於那時代的陳詞濫調掩蓋了事實。因為在一個長時期內，歷史學家寧願把注意力固定下來集中在那一時代的軍事方面，並且幾乎是戲劇化的方面上。只是在不久以前，歷史學家才注意研討那一時代的經濟現實。

其次，特別是由於統一歐洲的嘗試的失敗，使資產階級的編史學不得不把責任推在一隻受罪羊——拿破崙——的身上，他的“過度的慾望”，“強權的意志”，甚至是他的“脾氣”都足以說明一切並藉以免除解釋的困難。

* * *

這些嘗試中的第一個嘗試，也就是“督政府”的嘗試，決定於三件事實的湊合。

首先是法國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的事實。自從羅伯斯庇爾的垮台消除了民主共和國的假定以後，這是事實的狀態；共和二年的憲法對這一點下了法律的定義以後，這就成為

法律的狀態。

可是，在同一時期，對歐洲的戰爭，特別是對英國的戰爭却使同一資產階級喪失了海洋和殖民的空間——這原是法國資產階級經濟活動獲利最豐的方面，殖民地有的被敵人佔領了，有的起義了（聖多明哥）或被隔離了。長距離的貿易往來在實際上已是不可能了。

但這些戰爭同時也促成了對於大陸上廣闊空間的征服。經一七九七年的坎波·福米奧和約所確認的一七九五年條約使法國經濟得以通過直接兼併的手段來統治比利時和萊茵的市場，並且影響着、左右着荷蘭和西班牙的市場。

從這一方面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大陸的、也就是歐洲的經濟體系的思想，產生的過程，由於這是一個開端，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混亂和某些遲疑（方法追不上概念的水平）。毫無疑問，這個體系要由法國來組織並受法國的控制。這個體系是以對英戰爭的必要性為理由。正如督政官呂培爾寫給法國駐馬德里大使的信中所說：

“在我看來，同英國媾和，就意味着共和國的喪失……迦太基必須被毀滅^①……否則幾年以後，我們恐不再能輸出商品了。”

由於“在共和國的邊界上，一切都需要以現金交易”^②，最好用征服或臣服某些領土的方法來盡一切可能推遠這些邊界（西哀士在一七九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給塔力蘭的一封信中就是這樣來說明和論證對於姊妹共和國——法蘭西共

① 古代羅馬和迦太基三次連綿不絕的戰爭使羅馬害怕迦太基的商業競爭，元老院議員加圖每次演說都用“迦太基必須被毀滅”句為結尾，以示警惕。——譯者

② 共和四年霜月（第三月）督政府文告。

和國的真正被保護國——的侵略政策)。

儘管督政府內外交迫，很難以把這個“歐洲方面”作為政策的基本方面支持下去，但是，支持這個“歐洲方面”的跡象還是不少，並且是明顯的。

如果人們確實要發展這個歐洲貿易，那就應該供給它必要的工具，特別是在運輸方面。這就是弗朗索瓦·德·紐夏托的公路政策，特別是在比利牛斯山脈和阿爾卑斯山脈所實施的政策（但財政的匱乏徒使這些計劃暫時無法實現）。因此，就開始水路政策，萊因河應該是着手進行這個政策的工具，官方報紙鋪張揚厲地稱讚這個政策道：

“商品將要從許寧根到赫辛根間自由地流動着，並且我們將要看到北海和地中海連結起來播送我們工業的果實。”^①

在參加這項經濟活動的各國之間必須把度量衡統一起來。一七九八年十月十六日成立的國際米達尺委員會難道不是一個準備步驟麼？

爲了這些目的，反走私的鬥爭就有迫切的必要了。一七九八年佔領摩爾霍斯和日內瓦，從而掌握了和兼併了兩個重要中心。一七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法律恢復了前幾年關於反走私的條例並且把這些條例系統化了。

毫無疑問，必須盡一切可能把最多的國家納入法國經濟的體系中。這工作在巴達維亞共和國^②方面是輕而易舉的，因爲一七九七年二月七日，法國就和巴達維亞共和國締結了關稅同盟。對於那些十分馴服的國家——意大利各姊

① 摘自當時的“公報”。

② 巴達維亞共和國（一七九五——一八〇六年）是在法國所征服的荷蘭領土上建立起來的共和國。——譯者

妹共和國，情況也是一樣。對西班牙就比較困難了，西班牙的羊毛和黃金^①是很誘惑人的，但在那裏，由於西班牙大臣高杜阿的疑懼，談判就沒有成功。對於那不勒斯國王也是困難的，他於一七九八年拒絕封閉他對英國貿易的港口。

自一七九九年，這個嘗試的失敗已經顯而易見了。這是容易說明的。

因為，毫無疑問，督政府時代的法國沒有充分的生產足以有效地壟斷人們所要造成的歐洲市場（總的說來，當時法國的生產還沒有顯著地超出一七八九年）。而且這個政策在生產方面沒有得到所有資產階級的贊同（這是打擊這政策最嚴重的一點）。波爾多和南特兩地的商人、航運商和黑奴販賣商繼續對“海島”懷着一種夢想，並且對克復這些海島還不感到絕望。除了這些人以外，財政家們也需要同英國和解。塔力蘭也和他們一起；喬治·勒費布爾曾指出“塔力蘭希望同英國締結協定”^②。

而且督政府所繁殖起來的新富翁對有近利可圖的活動比起從事一個難而且緩的法蘭西歐洲組織來，却具有更大的興趣。

這就說明了波拿巴·拿破崙——這一資產階級^③的代

① 共和五年風月，法國財政部長拉美爾說：“同西班牙締結商約的利益在於使法國能從西班牙方面獲取一百萬彼阿士特。”

② 參見喬治·勒費布爾著“法國革命”（民族和文明叢書第十三卷第五〇〇頁）。勒費布爾還講到格蘭特夫人（塔力蘭的情婦）的一封信，根據這封信，塔力蘭要“討好他的英國朋友”。

③ 喬伯尼（以後是帝國的大臣）於一八〇一年八月二十日向保王黨德·安特萊古說道：“我們需要有一位作為君王的君王，因為我是所有者；一位具有主權的君王，因為我在其中佔有地位。為了制止革命，我們需要一位由革命產生的君王，他從我們的權利中引用他的權利。”

理人——爲什麼要在霧月以後同英國媾和。對於這個和平的期待以及這個和平所引起的歡欣(爲時很暫)就把曾經喧嚷一時的大陸概念拋在一邊。這個大陸概念不再顯得需要了。

*

*

*

英國退還了洋行和殖民地。波拿巴就在那裏重建奴隸制度。他的妹婿勒克萊將軍必須用嚴厲的手段去“綏靖”聖多明哥。西班牙所割讓的路易西安那也被包括在這個整體之內。殖民市場似乎被恢復了並且在從一七九二年以來第一次重建的和平中，自由經濟，“放任政策”似乎要取得勝利了。(讓·白蒂斯特·賽伊於一八〇三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大綱”，日後成爲自由主義的經典，這難道是偶然的麼？)

但從一八〇三年起，戰爭又發作了。而且在一八〇五年中，僅在幾個星期以內，兩件事變又重新在經濟方面促進了歐洲概念。這年十月，特拉法加海戰的潰敗又杜塞了海洋的航路和他們的財富。同年十二月由於奧斯特利茲陸戰的勝利而取得的外交制裁(十二月二十六日和普魯士簽訂了普列斯堡條約)却證明了還有擴充大陸空間的可能。

於是“偉大帝國”的理論形成了。以追念路易十四，特別是“西方皇帝”查理曼的鋪張揚厲的歷史引證來模糊理論和歪曲事實一廂情願地吶喊着“自然疆界”。這個理論難道不是兼併、臣服和調停的一種把戲麼？難道不是替“拿破崙家族”在被征服的領土上佈置政權的家族所要執行的政策麼？但是，很多人相信這種說法並且某些人至今還支持這種說法。

但我們却有拿破崙的宣言，也可以說是他的供詞如下：

“我曾經想要部署一下歐洲重大利益的歸併。歐洲

早就該成為真正單一的民族。

“我原想建立歐羅巴合衆國^①。

“我的兒子必須繼承我到處成功的事業，即用牢不可破的聯邦關係來團結歐洲。”^②

我們知道一般以為聖海倫島的文獻是流放和孤獨生活的成果，相約否認其歷史的價值。但在目前所說的場合下，這些文獻難道不是過去的情況、過去的企圖的單純的、稍為有系統的並且裝成崇高樣子的反映嗎？

追溯下一八〇六年，即上面所敘述的轉折時間吧。這個“歐洲聯邦”在那時不僅表現為一種思想上的看法，而且成為帝國政策的目的。

拿破崙皇帝說：

“這個美麗的歐洲，它的各國人民原應該成為一個偉大的家庭，却仍被太多的差異所分裂。”^③

他補充說：

“誰要擾亂歐洲和平，誰就是要掀起內戰。”^④

但這樣的說法不只限於皇帝一人。參政院參政員克列蒂諾—拉羅什早在一八〇六年就致力於確定這個聯邦的基礎：

“這個聯邦建立在各國的需要和富足的基礎上，建立在各國自己固有的工業的基礎上。”
(那就是建立在特有的經濟成分的基礎上。)當時的其他很

① “聖海倫島筆記”。

② 拿破崙的遺囑。

③ 一八〇六年三月五日關於格里曆的說明。

④ 這簡直是李奧合將軍(一八五四——一九三四年)一句話的提前，他也是一位極力主張統一歐洲的人物，他說：“任何歐洲的戰爭都是內戰。”

多人都贊成這種主張。讓我們只舉出學者拉普拉斯一個例子吧。

“幸賴皇上的天才，全部歐洲行將成爲一個大家庭，在同一宗教、同一法典下統一起來。”

而且政體的日益明顯的君主制的性質和統治階級的利益之間並沒有絲毫矛盾。如果說拿破崙要使“法蘭西帝國成爲其他主權國家的母國”^①，如果說他要人這樣寫着：他的兒子羅馬王“是二十個不同國家人民的聯系”^②，那末，他在一封私信中却很好地表明了他的真正思想：

“既然法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要使它的貿易在世界上繁榮起來……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我的原則是：法國高於一切。”^③

聯邦的遮眼法由此表現出來。在富有誘惑性的措詞背後，聯邦是把大陸資源提供給法國經濟去支配的手段。正如列寧所說：

“拿破崙的反革命專政把法國所進行的戰爭從防禦戰轉變爲兼併戰。”^④

正如在督政府時代一樣，但方式要更系統化，這種同英國（也是反英國）瓜分市場的企圖說明了這種方法並也應用了它的方法。

自一八〇五年以後，兼併政策在不同的領土上，在漢薩同盟各城市或在伊利里亞各省^⑤，都越來越具有經濟的性

① 拿破崙同德·雷摩撒夫人的談話。

② 一八一一年三月十日“帝國公報”。

③ 一八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拿破崙給他的女婿歐琴·德·波拿內的信。

④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一九〇頁。

⑤ 漢薩同盟是中世紀德意志北部各海港的貿易同盟，伊利里亞是亞得里亞海東海岸的山嶺地帶。——譯者

質了。兼併政策是由軍事佔領來決定的^①。由於領土的範圍日趨擴大，佔領本身就具有一種歐洲的性質。這是一支在拿破崙統率下由“二十個國家”組織起來的軍隊，其一切後果如下：徵募的種種苛求，向逃避兵役者作緊張的鬥爭，等於把各國入伍兵流放；派遣比利時兵和瑞士兵前往西班牙，而把拉·羅馬那的西班牙軍團送到丹麥，利用葡萄牙志願兵團和八萬那不勒斯士兵去進行對俄戰爭。像這樣的實例不勝枚舉^②。

根據這種概念，立法的統一也同樣是必要的。拿破崙向參政院的參政員們說道：

“如果你們要把一直到赫邱利之柱^③和堪察加半島的地區統一起來，那末，法國的法律就必須在那裏統治。”

他向富舍明確指出：

“我需要一部歐洲法典，一個歐洲最高法院，一種統一的貨幣，統一的度量衡，統一的法律。”^④

事實上，全部歐洲的統一雖沒有實現，歐洲三分之一已受法國參政院的管轄，而法國最高法院則對歐洲有司法管轄權。

① 拿破崙給他兄弟約瑟夫的一封信中說：“在被征服的地方，慈善不能算作入道。”（一八〇六年三月二日）。

② 當時“歐洲”司令部的組織不是沒有引起饒有趣味的糾紛的。一八〇七年六月十八日的報紙指出“霍亨索倫—蘇馬林根親王經過斯特拉斯堡到聖—奧梅去接收他的部隊的指揮權”。

③ 相傳古代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赫邱利曾在西班牙打破了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間的一座障壁，形成了直布羅陀海峽，希臘人稱爲“赫邱利之柱”。——譯者

④ 他把這點記在他的回憶錄中（第二卷第一一四頁）。